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 宁 骚 主编

〔澳〕 约翰·芬斯顿 主编

张锡镇 等译

东南亚政府与政治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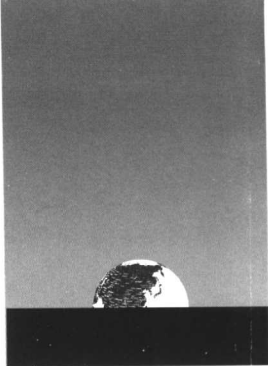
John Funst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 宁 骚 主编



东南亚政府与政治

〔澳〕 约翰·芬斯顿 主编

张锡镇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4-260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亚政府与政治/(澳)芬斯顿主编;张锡镇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ISBN 978-7-301-12716-2

I. 东… II. ①芬…②张… III. ①国家行政机关—研究—东南亚
②政治制度—研究—东南亚 IV. D7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8859 号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John Funston

©001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东南亚政府与政治

著作责任者: [澳]约翰·芬斯顿 主编 张锡镇 等译

责任编辑: 耿协峰

封面设计: 常燕生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716-2/D·185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5.25 印张 38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编委会

主 编：宁 骚

编 委：李 强 许振洲 关海庭 董正华 张锡镇

潘 维 唐士其 连玉如 金安平 白智立

执行编委：尚 英 耿协峰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John Funston

译丛总序

宁 骚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当这种方法被系统地用来认识政治现象时,就形成了政治的比较研究;当比较的对象是各自独立的政治体系时,这种政治的比较研究就成为比较政治学。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政治学,而他获取和分析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就是比较,这样他就同时创建了比较政治学。自19世纪中期起,经验研究和比较分析推动着政治学从思辨的哲学变成实证的科学。到19世纪末,政治科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比较政治学则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

比较政治学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比较方法必须贯穿该学科领域的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中。这一方法要求在同一研究中观察和分析的对象须是不少于两个并互为参照系的个体或群体,比较的直接目的是辨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比较始于对事物外部特征的描述,进而对其异同做出分析和解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但是要使比较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比较分析必须选择和使用一定的理论工具。因此,比较的方法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容纳其他理论方法和技术方法的一种方法。第二,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至少应当是独立的政治体系,所以现时代的比较政治学可以简括地界定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只有跨国的政治比较研究才属于比较政治学,明确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除此之外就难以划定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边界。但是,以民族国家为比较分析的单位,并不意味着仅仅把国家和政府作为直接观察的对象。事实上,被置于一定的民族国家的总体框架与情景中的任何政府和非政府单位,无论群体、组织还是个人,尽收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第三,比较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从客观存

在的事实和经验出发,进行实证研究或经验分析,从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通过描述、解释和预测来认识政治现象,是这门学科的基本特征或另一核心要素。对比较政治学来说,真理是具体的。一切既有的概念、命题、模型和理论的真理性,都有待于经验和事实的进一步验证,都以各个事物发生与沿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换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有一条主线,这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才能更有效地使政治的跨国比较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比较政治学的这种科学诉求或科学化努力,迄今已经经历一系列重大的范式变迁。在19世纪,历史主义是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这一名言成了比较政治学者的共同信条。人们把科学的方法理解为“历史—比较”的方法。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制度主义成为这门学科的主流范式。人们相信,在宪政民主制已经巩固的条件下,由现行法律体系确立的一系列正式制度规范,制约和决定着各种政治主体的实践活动;而现行法律体系是人们在关于国家与法的政治理念指导下构建起来的。政治哲学—法律体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跨国分析的典范思路。因此,这种制度研究法又被叫做法律—制度主义。同时,这一主流范式并不排斥或贬抑历史主义;相反,在获取和处理实证材料的基本方式上,以及在对制度变迁和制度规范作用于政治实践的过程与结果的研究上,它必须借助于历史主义。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取代法律—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行为主义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引进的一种方法论,它与刚刚兴起的电子计算机和社会统计学的应用相结合,使比较政治学在获取和处理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上发生了巨大变革,不仅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门学科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全球的范围,而且使这门学科朝着科学化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此,比较政治学不再仅仅是静态、描述的,而是动态、解释性和预测性的,理论的建构与验证成为研究的动力和目标。60年代末,比较政治学开始转入后行为主义时期。后行为主义不是一种研究范式,而是多种范式的并立和竞争,影响较大的先是依附论、世界体系论范式,接着是组合主义或法团主义范式,现在是新制度主义范式。

新制度主义被区分为三种既有联系而又有显著区别的分析路径:理性选

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由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个演绎的逻辑体系,社会学制度主义不能清晰地区分文化与制度,因此只有历史制度主义对比较政治学这门经验科学来说,才具有广阔的适用前景。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关系。它把制度看作是一定的历史情景的产物,而制度塑造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并且影响着行为者的整个行动过程及其对工具性行为的选择。它认为个体是深深地嵌入制度网络之中的,个体偏离制度会使其境况变得更坏;制度对于解决集体行为困境的贡献越大,它就会越有活力。它将焦点集中在展示一定的政治现实中多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作用,通过将结构化要素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揭示制度是如何构建这些互动关系并藉以影响政治结果的。历史制度主义提供的新视角,可使比较政治学更加有效地去解释当今世界各国内部政策的延续性和不同国家间政策的变异性。

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和历史情境之间关系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解释的困境,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指明了走出困境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历史研究法是一切实证科学的唯一方法,这种观察方法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现实生活发展过程中的人。他们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对一定的个人进行的经验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同时明确地认识到影响这个过程的还有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也认识到各个人都有其自己的、方向各异的“自觉期望的目的”并对外部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就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导致了一定的历史情景的形成。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揭示出了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的更深层次的动因,从而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更有解释力的一种方法论。

比较政治学的每一种主流范式都有众多的学者遵循,并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归类,我们可以把比较政治学划分成这样几种基本的研究领域:(一)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学辨识不

同民族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各种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异同并解释导致异同的原因,用统一的概念体系来认识和表述这些复杂的因果关系,进而抽象为理论。这样的理论在经验层面可证伪,从而确定其解释力的强弱和范围。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积累是极其丰富的。自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起直到现在,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大多出现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对比较政治学来说,任何既有的理论的真理性和真理性都有待于新的事实和经验的检验,因此被积累起来的理论成为新的研究项目的理论假设的来源和分析框架,从而具有方法的功能。由此可见,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是统一的。(二)比较政治制度。在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以前,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政府或比较政治制度。自比较政治学诞生以来,政治体制始终是这门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政治体制是由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统治者和管理者的行为准则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构成的整体。政治制度凝聚了所有种类的权力,约束着体制内外各种人的行为。观察和比较本国与外国的政治制度,是认识和理解人们的政治行为的最方便视角。因此,尽管曾受到行为主义范式的有力冲击,比较政治制度仍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领域被保留了下来。(三)比较政治行为。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可区分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两类。比较政治制度只观察和比较制度性行为,非制度性行为不在其视野之内;而比较政治行为则对二者都进行研究,并注重观察和比较非制度行为——既包括体制内各种政治角色的非制度行为,如腐败、贿选、幕后交易、营造和维护非制度性社会关系网络等,也包括体制外各种政治角色,如政党、利益集团、社会团体、大众传媒、辅助决策机构(智囊团)、企业界和学术界精英以及宗教、族群、社会阶级与阶层等的政治行为。对比较政治学来说,比较政治行为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研究视野,增强了它的理论构建能力,推动着它生发出政治社会学、政治传播学、民族政治学等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从而使之真正地担负起了政治学科学化重任。(四)国别政治与地区政治。比较政治分析是建立在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系统的、深入的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分析就失去了实证的基础。

比较政治学到现在已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这门学科的所有主流范式都得到了引进并被应用于研究工作中,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

果。我国的比较政治学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法律—制度主义从这门学科被引进时开始，长期处于主流范式的地位，至今仍在政府颁布的高等院校专业分类目录中有显著的体现。第二，没有经历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的阶段，科学化不曾成为这门学科的强烈诉求：获取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始终是汇集既有文献记录而不是社会调查，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极其罕见。第三，在从事比较政治分析的学者中，很少有人做过或同时在做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的研究；而在从事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研究的学者中，也很少有人真正地关注比较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就是说，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尚未能够正确地处理特殊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理论与经验的关系。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向世界，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观照自己的国家，比较政治学将适应这一需要开创学科发展的新时代。为推动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有选择地评介国外的学术成果是十分必要而且必需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体察到这一情势，筹划、组译并将出版《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这套丛书收入的著作侧重于可以辅助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甚至直接可用作教材的作品，具有入门引导性质，但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能够相当系统、全面地勾勒和凸显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对象、议题和方法，介绍和反映在这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构建和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我相信，这套丛书会使有志于学习和研究比较政治学的读者受益良多。

2004年4月12日

译 序

2001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出版了由约翰·芬斯顿主编的《东南亚政府与政治》。2003年初,在访问新加坡期间,一位朋友将该书的英文版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当时我就产生了翻译成中文的念头。2004年我们获得了中译本的版权,并很快组织翻译。由于种种原因,它的中文版今天才同读者见面。然而,这距本书英文版的面世已经过去了6年。这对作者、译者和中国读者都不是一件幸事。不过作为一部力作,时间不会磨灭它的价值的光芒,相反能增添它的光辉。这就是有些书在面世后的多少年一版再版的原因所在。

本书的编者约翰·芬斯顿博士是一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者,东南亚问题专家,尤其是泰国问题和马来西亚问题专家。他在东南亚工作大约14年,曾在国立马来西亚大学和文莱达鲁萨兰大学任教多年,教授东南亚历史、政治等课程。1997年至2001年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这期间,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利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得天独厚的学术氛围和图书资料优势、按国别撰写了一部高水平的地区性的比较政治学专著——《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可以说,它代表了20世纪东南亚地区比较政治研究的最高学术成果。

芬斯顿博士在该书的绪论中简述了关于东南亚政治研究的英文著作出版的历史情况。他列举了上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关于东南亚政治的代表性著作。应该说本书的出版是本领域研究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显然,它必将成为新世纪东南亚政治研究的新基石。

在中国,较系统和较完整的东南亚政治的研究和教学起步较晚。1989年春,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开设了东南亚政治与外交的本科课程,以后又陆续开出了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东南亚政治课程。当时的东南亚政治的教

学苦于缺乏教材,于是在1994年我的第一部拙著《当代东南亚政治》问世,缓解了教学上的急需。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又在台湾于1999年出版了《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在东南亚政治的教学和教材建设方面,对我个人帮助最大的是芬斯顿提到的那些书。尤其应该提及的是克拉克·内尔教授的著作和他本人对我的帮助。内尔教授是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著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尤其是泰国问题专家。他曾在泰国工作和教学多年。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我的东南亚政治教学缺乏教材,未征得他的同意便将他的《东南亚政治》一书翻印,作为本课的主要参考书。后来在同他的个人联系中,他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而且还把他的新作《新国际化时代中的东南亚》一书寄给了我。为了感激他,几年后我邀请他到北大讲学,并亲自给我的学生讲授了几次东南亚政治的讲座。

在东南亚政治领域的中文著作中,可以作为教科书的还应当提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东南亚问题专家顾长永教授。他于1995年出版了《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很可惜,由于发行渠道的问题,中国大陆学生很难读到该著作。1998年,中山大学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汪新生教授出版了《现代东南亚政治与外交》的专著,开创了观察东南亚政治的新角度。此外,近些年来,还有许多有关东南亚国别政治的著作纷纷问世。所有这些无疑为中国的东南亚政治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们翻译出版芬斯顿主编的《东南亚政府与政治》一书目的在于借鉴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了解国外学者观察东南亚政治的不同视角。本书除了它的学术意义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对教学的意义。在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选择一部好的教科书或重要参考书。一本好的教科书可以惠及很多届学生。这部《东南亚政府与政治》有明显的基础性、系统性和综合性,比较适合学生阅读。尽管有些资料需要更新,但总体来说该书不失为一本较好的教科书和重要参考书。

该书突出的特点是,第一,按国家分别设章,便于集中完整地把握一国的总体情况。第二,每章均选出大体相同的专题进行解剖分析,加之最后总结部分的综合归纳更容易使读者从比较的角度观察问题,从而达到更深刻的理解。第三,在对政治的讨论分析之前,对每个国家历史、社会等国情背景都有概括的介绍,更方便初学者的入门。第四,有比较完整、准确和权威的各方面的统

计数字资料,这对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最后,作者们在写作的过程中都尽可能汲取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因此文中的某些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参考文献,我们基本上保留了注释中的英文原文。在翻译过程中有许多专有名词和人名地名基本上采用了约定俗成的称谓。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删节,请作者和读者给予谅解。对于翻译中的错误和纰漏,请广大读者斧正。

张锡镇

2007年7月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作者简介

罗杰·克肖(Roger Kershaw): 曾任赫尔大学和肯特大学东南亚研究讲师, 后来到文莱教育部工作(1984—1994)。

索庞·皮奥(Sorpong Peou): 东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学院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副教授, 1995—1999 年曾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安东尼·L. 史密斯(Anthony L. Smith):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尼克·J. 弗里曼(Nick Freeman):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约翰·芬斯顿(John Funston):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 2001 年 3 月前曾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丁貌貌丹(Tin Maung Maung Than):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华金·L. 冈萨雷斯第三(Joaquin L. Gonzalez III): 加利福尼亚旧金山金门大学公共行政项目主任, 旧金山大学太平洋中心研究员。

柯受田(Jon S. T. Quah):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

他威蓬·瓦萨瓦昆(Thaveeporn Vasavakul): 驻越南河内的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东南亚地区项目主任(常驻主任)。

前 言

我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四年里,大部分时间是花在这本书上了,从本书的策划到完成。身在东南亚来研究东南亚,如果说有烦心时候的话,也是悲喜交加,但这项工作还是令人兴奋的。1997 年致命的 7 月 2 日,泰铢开始浮动,它对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至今还在持续。这一切使我简直无法承受。东南亚研究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去跟踪这种发展,从而保证了这些发展在本书中有所反映。

本书基本上是一部东南亚研究所内部的成果。10 个国别章中的 6 章是由东南亚研究所研究人员承担的,其他各章的作者也同本研究所有多年的交往,也是东南亚研究所庞大的所友网络的成员。他们乐意遵从一个共同的框架;耐心地接受了繁杂的编辑方面的要求,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激。在本所的其他人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没有所长谢陈秀瑜(Chia Siow Yue)教授的支持,本书的面世是不可能的。行政部门提供了宝贵的协助,特别是在对大量的稿件精心复杂的文字加工处理方面。出版单位进行了精湛的文字编辑、索引编排和设计,最后提供了成书。图书馆以它无与伦比的东南亚方面的藏书给予了支持。苏珊·洛(Ms Susan Low)为每一章编制了重要的统计资料。

我在东南亚地区研究东南亚的 30 年里结识了众多来自各界的东南亚朋友,对他们的好客和友谊我深表感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从各位学者、政治家和官员的慷慨相助中受益匪浅。这笔欠债是不能偿还的,但我至少希望本书所引起的反馈见解能准确地传达给我,从而为更好地理解东南亚复杂多样的政治画卷作出贡献。

约翰·芬斯顿

绪 论

试图用一部书来论述东南亚 10 国的政府与政治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举动。近年来,关于本地区的论著不少,但大多集中在一个单一国家或一个单一问题(如民主问题、选举问题等)。然而,很需要有一部简明的、最新的、综合性的著作来集中讨论东南亚所有国家的核心政治问题,即政府机构和政治实践。就作者所见,学者、政治家、记者以及其他人士常常谈及出版此种著作的必要性。

过去,曾经有过几次满足这种需求的尝试。在“东南亚”(用来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战区)一词被采用之后,就出现过几本早期著作。但第一部较详细的著作是乔治·卡欣(George Kahin)编辑的《东南亚政府与政治》,于 1959 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1964 年,此书经扩充和修改后再次面世。¹当时涉及的国家有 8 个(不含文莱,而新加坡作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分别从四个专题来讨论:历史背景、社会经济背景、政治进程,以及主要问题。这是一部开拓性著作,后来的著作没有一本在质量上能同该著作相提并论。

另外一部是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的《东南亚政治制度》,出版于 1969 年,1974 年再版。²此书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对该地区进行考察,而不是逐个国家的讨论。尽管这部结构严密的专著不足 100 页,但它是一部关于该地区主要问题的优秀的综合论著。开头几章考察地理、历史、经济、社会组织和价值体系,接着讨论意识形态、政治动力(政党、领袖、军队、文官体系、利益集团和共产党抵抗运动的作用)、政府机构(对宪政权力划分的广泛观察),以及政府的运作(政府凝聚国家和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

上世纪 70 年代,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和理查德·巴特韦尔(Richard Butwell)又出版了两本关于东南亚的比较研究著作。这两本在讨论政治机制方面不像派伊全面,更多的是集中在后殖民时代面临的困难和从民

主向权威体制的倒退等问题上。³

70年代,还有一个趋势,即就同一主题的国别研究。康奈尔大学首倡并出版了一套《东南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包括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国别研究单行本。⁴1976年,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协调下,一些地区研究学者建立了“东南亚研究项目”并出版了关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四部著作。⁵

黛安娜·莫齐(Diane Mauzy)主编的《东盟国家政治》于1984年面世。⁶像卡欣编著的那部著作一样,这一部也是按国别设章,每章均以历史和社会经济总论开始,接着是关于政治的方方面面,以及政府的性质(谁统治,如何统治,代表谁)。90年代,克拉克·内尔(Clark Neher)又丰富了国别研究,他出版了三版《新国际化时代中的东南亚》。⁷各章都以社会政治历史总论开始,接着论述机构和社会团体、民主化、经济发展、国家以及对外政策。

自80年代以来,一批比较研究的著作面世。1981年内尔第一次出版的《东南亚政治》(1987年第二版)是最综合全面的著作之一。⁸该书基本上采取政治史的分析方法,同时对政治文化、农村政治以及政治动力(从政权的性质,即是否军人权威主义、文人权威主义、共产党权威主义,或民主政治,来分类比较分析各个国家)进行比较考察。此外还有几部专题著作,分别集中在政治经济⁹、民主¹⁰、军队¹¹、选举¹²,以及传统主义政治(“面对来自西方的要求变革的政治压力,东南亚国家所采用的各种方式,以维护、恢复和适应政治权力的传统模式”)¹³。

本书内容

同以往此类书相比,本书处于何种地位呢?本书的主要焦点集中在讨论核心的政治学相关问题,诸如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关键政治议题。众所周知,政治制度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因此每个国别章节开始都要宏观地介绍该国的历史、社会、地理和经济。同时要附上关键的统计数字,包括幅员、人口、国民生产总值(GNP)、收入分配、人文发展和武装部队。这些统计数字必须小心对待——有时不同的标准用于不同的国家,有时由于采用不同的方法,结果也有变化——但是要尽可能多地使用同样的资料来源,这样它们至少可以作为宏观的比较指标。

政治体制

对政治体制的分析,先是根据国家宪法,对政府结构进行全面的介绍。然后所讨论的问题是:该国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国家;君主国还是共和国;议会制还是总统制,以及地方政府结构的性质。

在明确了宏观的政府框架之后,接着转向对主要政治制度的性质和重要性的研究。“制度”(institutions)一词这里意指两种正式结构(像议会)和更加宽泛的政治实践(包括意识形态和人权)。本书所说的主要机构包括国家领袖、行政机构(内阁以及军人和文人官僚体系)、立法机构、选举、司法机构、政党、意识形态、公民社会和人权。

政治议题

每章讨论完制度框架之后,重点就转向每个国家的主要政治议题。这里采用的方法是将传统的政治学相关问题同另一个更加新近出现的政治学问题结合起来。至少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政治理论家们就提出了“谁掌权”和“谁获益”的问题。“谁统治”的问题集中在参与重大决策的人员数目上和哪些集团起主导作用,是政党,是某一特定阶级,还是某些势力,如军队或文人官僚集团。同“谁获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要看哪些个人和集团从政府政策中获利最多。利益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表现为其他形式。例如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所获得的宪法利益不限于诸如在教育、政府雇员、土地保留制等方面的具体优势,而且也包括其他特权,诸如将“*Bahasa Melayu*”作为国语,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国家元首只能是马来人等。

很多年来,政治学家关心的另一个议题是政治合法性,其含义是在多大程度上公民能服从政府,不是因为恐惧和强制,而只是由于相信这样做从道德上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在这一概念的经典解释中,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注意力集中在合法性的三个不同的基础上:传统、魅力和法理。后来,理论家们又增添了第四个基础,即有效性,特别是能表现出推动经济迅速成长的能力。评价合法性涉及到关于公众对政治制度或政府支持程度的判断,这种判断是困难的,有时是主观的。有些政治制度也许享有很高的合法性,诸如泰国的君主立宪制,或菲律宾的总统制,而同时具体的政府却具有较低的合法性。选举